

社会主义 与人的现代化

——邓小平关于人的现代化思想研究

SHEHUIZHUYI
YURENDEXIANDAIHUA

常樵 等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社会主义 与人的现代化

——邓小平关于人的现代化思想研究

SHEHUIZHUYI
YURENDEXIANDAIHUA
常 樵 等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社会主义与人的现代化
——邓小平关于人的现代化思想研究

著 者 常 樵 等
责任编辑 杨晓红 封面设计 张 迅
责任校对 陆 雨 版式设计 胡学军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0431—5649710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制 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0431—5637018
印 刷 者 长春人民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7.87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2918-3/D·1057
定 价 13.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导 言

1. 人的全面发展与邓小平理论

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并且把它提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层次。他说：“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最早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他们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之初，在对人类社会及其活动做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基础上，揭示了无产阶级及整个人类解放的目标、条件和途径。他们把人的全面发展即共产主义的实现视为社会和人的发展的最高境界。他们认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人才最终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

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这也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光辉思想，照亮了人类社会前进的里程，成为人类前行的指路明灯。

很显然，实现人类这一美好目标，需要漫长的路程。人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互为因果，同步进行。应该说，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指明了一种历史趋势，人类社会不断地朝着这个目标行进，不管中间有多少迂迴曲折，总的的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在人类历史的每一个阶段上，人们都会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这里不乏伟大人物、科学巨匠的作用，他们和广大群众互相辉映，书写着历史上一幕幕壮丽的景致。

我们的社会，现在已经走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心任务和中心工作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这个阶段上，人的全面发展应当做些什么，做到什么，怎样实现，等等问题摆在我面前。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在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从中看到了其处处以人为中心，为了人，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特点。

邓小平理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在邓小平的现代化理论中，有关于四个现代化，即：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的大量论述和丰富思想。这方面的内容已为世人所关注，这方面的论著也十分浩瀚，研究角度纷繁多彩。但与此同时，邓小平理论所包含的大量的有关人的现代化思想，关注研究尚欠。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关于人的现代化思想，隐遁于其他理论之中和背后，与之共生。实际上，邓小平从不同角度对人的现代化问题作了

大量论述，应当把它作为一个独立课题提炼出来。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人在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主要基础的邓小平关于人的现代化思想，无论是作为一种思想成果，还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理论指南，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产生着巨大意义。

心路的轨迹可以来自逻辑的推演，也可以来自实践的呼唤。更多地引起我们对邓小平关于人的现代化思想的注意的，是后一个条件。

2. 现实的呼唤

问题一：

据 2000 年 9 月 24 日《城市晚报》报道：

经某单位介绍，不足 14 岁的松原市小姑娘来到长春，在一职工家做保姆，替人看 15 个月大的男婴，9 月 22 日下午，她因男婴哭闹而心烦，遂打了婴儿几下，并将其放在地毯上，后见男婴还未停止哭闹，她就抓住男婴的头往地毯上猛撞。男婴继续哭闹，她又将男婴抱到床上，捶打男婴胸口数下。男婴仍旧哭声不止。这时她心烦至极，抓住男婴双脚，使其头朝下脚朝上不停晃动，一下没抓住，男婴头朝下撞在了地上。这次，她把婴儿抱起来时，发现男婴已双目闭合，没有反应。她意识到自己闯了祸。慌乱中，她首先给男主人打了电话。男主人和女主人迅速赶回家，将孩子送到医院，抢救无效，孩子死亡。男主人迅速拨打 110，巡警将小保姆带走，送到公安局。该报前一天的报道中写道：当记者见到小保姆后，吃惊地发

现，她竟是一个梳着高吊马尾辫的孩子，蜷缩在沙发一角，目光呆滞。她在发现自己闯了祸，给男主人打过电话后，又找出主人家四五瓶不知名的药吃了下去，又用菜刀在自己手腕上割了几刀之后躺在了床上。离开公安局后，记者的心情十分沉重。公安局经过调阅户口和实地查证，证实小保姆的实际年龄未满 14 周岁，依刑法规定，尚不够刑事责任年龄，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遂作出决定，由其监护人（父母）看护，带回家中。14 岁的孩子为何当了保姆？父母说：“辍学在家，呆着无事，家里又困难”，经村干部帮助联系介绍，当了保姆。介绍单位说：到农村招工，通常是委托乡镇干部联系人选。委托时，要求年龄必须在 18—20 岁之间。由于是委托单位介绍的，遂没对年龄产生怀疑。而男婴的父母欲哭无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依然不相信已成悲剧的事实。

这篇报道的题目是“这到底是谁的错！”

虽然法律有明文规定，但改革开放以来，雇佣童工的事情还是不少发生的，而且这里常常包含有“愿打愿挨”的成分。

当然，这不仅仅是使用童工的问题。问题的出现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如小保姆父母所言：“家里困难”。尽管我们下了很大力量解决贫困人口脱贫的问题，但按照学者统计，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在我国现在达 0.45。这已经超过了国际上通常认为的基尼系数在 0.3—0.4 之间的中等贫富差距程度。短短十几年间，我国已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超过了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富人是如何“致富”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90 年代中期搞过一次调查，被访对象在对“富有者有多少人是通过正当手段致富的”这一提问回答时，认为很多的仅占 5.3%，较多的占 14.5%，不太多的占 48.5%，几乎没有的占 10.7%，不知道的占 20.8%。

实际情况多少跟老百姓的看法会有些出入。那么，“穷人”到底穷到什么程度？依国家统计局有关做法，若按 5% 比例推算的话，我国城镇处于绝对贫困的居民总数至少在 1 200 万人以上，其他相关估算也都在 1 200—2 000 万人之间。而且，我国现阶段贫困人口也有其“中国特色”，即：除了普遍存在于各国的社会弱势群体外，我们还有一个由经济效益不好的企业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下岗职工为主体组成的贫困职工群体，且数目较大。这是我国目前贫困人口急剧扩大的主要原因。这个阶层普遍存在着收入低下、收不抵支，债务问题突出、高恩格尔系数、低消费和低营养标准等特征，只能维持简单的生活，一些指标甚至接近或达到了极限标准，教育及医疗水准严重低下。据 1996 年国家统计局按五等分组报告城市居民金融资产的分布图表，最高一等 20% 的居民占有 48% 的金融资产，而最低一等 20% 居民只有 4% 的金融资产，相差十分悬殊。一边是挥金如土，一边是“希望工程”。由分配不公带来的对贫富悬殊差别的不满心理，是可以改变为认为社会不公的心态的。据统计数据反映，刑事案件之增长与基尼系数之增长呈正相关之势，而杀人与抢劫等之增长更是如此。我国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从 1986 年的 0.19 上升到 1994 年的 0.37。与此相应，刑案总数由 11.2/万上升到 34/万，杀人案由 1.6/10 万上升到 4.1/10 万，抢劫案也由 4.0/10 万上升到 34.9/10 万。我国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由 1986 年的 0.31 上升到 1994 年的 0.41。刑案总数由 1986 年的 3.7/万上升到 1994 年的 7.9/万，杀人案由 1986 年的 0.35/10 万上升到 1994 年的 1.7/10 万，抢劫案由 1986 年的 0.91/10 万上升到 1994 年的 7.0/10 万。再看城乡居民的基尼系数与犯罪的关系。我国城乡居民的基尼系数从 1988 年的 0.38 上升到 1994 年的 0.43。于此同时，刑案总数也

从 1988 年的 7.59/万上升到 14.11/万，杀人案则由 1988 年的 1.46/10 万上升到 1994 年的 2.26/10 万，抢劫案则由 1988 年的 3.33/10 万上升到 1994 年的 13.53/10 万。几年前，河南灵宝破了一个大案，三个人几年间杀了八十多人。为首的是一个 1966 年出生的人，小时候随母要饭为生。17 岁时他把母亲卖了，尔后就开始杀人犯罪。手段非常残忍，一杀一家。他的世界观形成与其经历有关。他要饭过程中，接触白眼多，被人看不起的时候多，日积月累，使他产生了对社会的仇恨，遂对社会进行报复。现在，社会治安已经成了一个群众关注的非常普遍的热点问题。新盖的房子，都装上了防盗门，还是不放心，又装防盗窗、防盗网。

至于不把雇工当人待的例子也是俯拾即是。1993 年一篇《广东“三资”工人权益急需法律保护》的报道中反映，百万三资企业，百万厂规厂纪，都是以老板利益为宗旨的。以罚代管非常普遍。宝安一个厂 22 条厂规厂纪加起来罚款总额达 650 元，东莞一个厂 21 条厂规厂纪有“开除”二字的达 11 条。好多工厂公然违法，第一条就规定身份证必交厂总部保管。工人称厂规厂纪为绳子、皮鞭。有的厂通宵加班，不去就以违反厂规厂纪论处。老板很少想安全问题。国营企业的职工一旦成了“亡厂奴”，待遇也不会比这更好。洛阳色织一厂在负债 1 481 万元的情况下于 1992 年被迫停产，被一家私有企业用十分苛刻的条件收购。收购者提出，政府要免税 20 年，挂账停息 20 年，20 年后按原资产归还；只接收 1/3 青年职工到该企业下属的养猪场里喂猪。一句话，就是卸债、撵人、清场、要地皮。后来，由于工人采取了“革命”行动，才避免了任人宰割的厄运。到了 2001 年，仅 8 月报端就披露了三起虐待工人的典型例子，《文汇报》8 月 29 日报道了武汉的“童工作坊”。

《工人日报》8月28日报道了上海一家日资企业重演旧中国残酷一幕“包身工”，夏衍笔下的“包身工”制在解放了的中国死灰复燃。还有深圳韩资企业对56名女工非法搜身，经过长达月余交涉，法律干涉，最后每人赔4000元了事。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肯定了傅立叶的一句名言：“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然而，色情服务泛滥在我国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了。2000年7月初，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披露了山东省青岛市一些娱乐场所黄、赌、毒泛滥，公然出现了“脱衣舞”。同年7月21日，《北京晨报》，又披露了京城某俱乐部抓获两名正在表演的“脱衣舞娘”。几年来，色情服务大有发展趋势，所以才开展全国范围的“扫黄打非”行动。那么，都是谁在享受色情服务？谁在提供色情服务？有的文章分析：享受色情服务的，除乐于此道的某些商人及外国商人外，主要是某些有钱、有权、有钱又有权的人。提供色情服务的，绝大多数的为无产无业的城市贫困居民的女子，失业下岗职工的妻女，以及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的妻女。生计无着，生活所迫，是她们从事此道的基本原因。在这个可悲的群体中，基本没有各级各类官员、有产阶级和生活富裕的家庭的千金小姐们。还有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的屡屡发生，人不过就等同于一个物罢了。为解决此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打拐专项斗争。

上述种种现象的出现，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改革？尽管它不代表全局，但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为什么改革，当然是要使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包括物质的、政治的、精神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鲜明地提出，“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五”计划的建议再次强调：

提高城乡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我们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这一切都说明，人，广大劳动群众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中心。他们的利益是我们的一切。把握好这一点，涉及到改革的目的、方向和性质，涉及到社会主义的形象和基本原则。改革就是为了更好地保证和提升他们的权利、尊严和价值。如果侵犯他们的权益，贬损他们的价值，就有悖于改革的初衷，也有悖于社会主义了。解决不好，会导致社会分裂为两个部分。正如邓小平所讲：“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111页）

问题二：

近年来，部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在造假能力方面得到了长足发挥。假名牌、假广告、假商标、假支票、假烟、假酒、假药、假唱、假资产、假合资、假数字、假情况、假政绩、假文凭、假典型、假干部、假关系，……总之造假贩假渗透到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1993年3月12日，《南方周末》报第五版，近整版篇幅报道了《中国假药第一案——河南省周口地区第一制药厂特大假药案调查纪实》。内容触目惊心。最令人惊奇的是，这个从1986年开始年年制造假药的厂子，竟然被河南省沈丘县评为先进单位。是沈丘县的9个特级企业之一。1991年，该厂被县政府命名为“重合同讲信用”企业，1992年，县农委三次表扬该厂为“先进企业”。厂长王志强，中级政工师，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劳动模范。1992年2月，被提拔进县农业局

领导班子，定为副局级干部。

1998年初，山西假酒案致死多人，引起的震动至今令人心有余悸。

问题蔓延之广大，影响之深远，竟到了要中央领导讲话和中央政府发文件以解决的地步。

新华社北京2000年11月6日电，国务院近日发出通知，严打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者。通知中说，近年来，我国产品质量总体水平有了较大提高，部分产品质量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的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绩，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犯罪活动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有效遏制，主要表现为：假冒伪劣商品品种多、数量大、范围广；有些地方区域性、集团性、大规模地制假售假问题越来越突出；有些地区拒绝、阻碍或者以暴力手段抗拒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打假任务的事件时有发生。假冒伪劣商品横行，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危害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侵犯消费者和企业的合法权益，干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同时，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还严重腐蚀干部队伍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败坏社会风气。通知从五个方面对全国新一轮打假作了部署。通知最后明确国务院责成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会同有关部门在来年适当时间，对这次打假联合行动的进展情况进行一次检查。成绩突出的，要通令嘉奖；打击不力，敷衍塞责，不能在限期内扭转局面的，由监督部门依法追究当地政府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应当说，够严格的了。

通知还仅仅限于解决假冒伪劣商品。那么，其他领域的假，谁来解决，如何解决呢？如：假数字、假干部、假年龄、假政绩、假文凭，等等。

2000年第17期《半月谈》载文——“全国假文凭知多少”。文中写道：据了解，在今年全国人口普查时，填写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人数比国家实际培养的人数多出50—60万人，这意味着中国有50—60万人持有假文凭。这个数字是教育部一位负责人作出的估计。尽管用人单位可以通过文凭发放单位查询所有文凭的真伪，但在全国范围内核对每一个文凭几乎是不可能的。

《文汇报》2000年11月2日刊载了这样一则消息：长春税务学院新生成绩太差。文中说，长春税务学院近日对新入学的1200名新生进行数学和外语两个学科的摸底考试，结果令人人大吃一惊：数学最低分仅3分，外语最低分17分。而这些新生的入学成绩都在480分以上。因没有相关法规，学校明知这些学生有“猫腻”，却没法作出处理。据悉，为了解学生的实际水平，进行分级教学，学院举行了新生摸底考试。结果满分为120分的数学考试中，20分以下的有40人左右，最低分为3分。120分为满分的外语考试中，20分以下的1人，20分至39分的25人，最低分为17分。试题难度大吗？据该校教务处负责人介绍，试题是模仿高考题出的，难度却比高考低得多。学生们为什么考出了如此令人不可思议的低分呢？教务处负责人直截了当地说：高考替考、考场作弊等是主要原因。他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在去年的新生摸底考试中，也发现有的学生数学只打了几分，为了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学校进行了跟踪调查，结果发现这名学生在每学期的期末考试中都有几门课程不及格，而且分数低得可怜。学习如此差的学生混入了高等学府，学校该怎么办？教务处负责人十分为难地说，学校现在一点办法也没有，明知学生有问题，但也不能把他赶回家，因为没有这方面的政策。

无独有偶，2000年6月16日《文摘旬刊》报道：监考太严无法作弊，1/3参考者退出考试。文中说的是，某省委党校2000年在职研究生入学考试。尽管《招生简章》中明确规定入学必须经过考试，党校还给每位考生发放了学习资料并进行了考前辅导，但仍有考生没有认真学习或根本就没有学习，试图靠作弊蒙混过关。为此，这些人在考前作了充分准备，有的缩印了全部复习资料，有的将重点题目记在了一张张小卡片上。但由于监考较严，无法作弊，一区的150名考生中，约有1/3的人因自忖过不了关而先后退场。

还有，科学的殿堂应当是高尚和神圣的，可是当前，科技界竟普遍存在着急于求成，热衷跟踪模仿，追求论文数量，评价和宣传浮夸不实，学术争论开展困难和跨学科协作很少等现象，在少数人中还出现弄虚作假、包装炒作、抄袭行骗等违反科学道德的行为。这是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在中国科协2001年年会上讲的一段话。难道不应引起警醒和深思吗？

人，生活在难辨真假的环境中，需要时时提防“上当受骗”，这该是对人性的多大摧残。而造假者的精神世界又是何等卑鄙和猥琐。

问题三：

发生在干部队伍中的腐败，几乎令世人对反腐斗争丧失信心。纵向，从基层领导，直至中央、国家级领导；横向，遍及各行各业。具有范围广、人数多、情节重、层次高等特点。

仅在2000年，就有两起震惊世人的巨型腐败案件被揭露出来。

一起是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受贿案。成克杰

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成克杰是广西群贪中分量最重者。这里的贪官不仅数目众多，而且落水者官阶也节节升高，从副县长、市银行行长、副市长、自治区副主席直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涉及层面之广，从基层、中层、高层到国家领导层，从党、政、金融到公安、司法，无不出现腐败。据有人不完全统计，1999年7月，广西玉林原支行行长梁用浩，因受贿被判死刑；8月，广西原自治区副主席徐炳松，因受贿被判无期徒刑；10月，广西钦州市原市委书记俞芳林，因受贿受审；12月，广西钟山县支行行长蔡军，因受贿擅开近两亿元的银行汇票被判有期徒刑12年。2000年5月，广西原交通厅党委书记褚之田，因受贿被开除党籍；5月18日，广西贵港市原副市长李乘龙，因受贿被枪决；6月，成克杰被提起公诉。广西贪官如此前仆后继，令国人震惊。广西人对此既感到憋气，又有些不服，“难道其他省没有腐败贪官！我们这里有，说明我们能把问题揭发出来；你们那里没有，并不一定是完全没有，可能是根本揭不出来，腐败的盖子捂得严”。言外之意，你们或许还不如我们。

另一起是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公布的厦门特大走私案首批25起案件公开宣判的情况。电讯稿指出，厦门特大走私案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案情极为复杂、危害极其严重的走私犯罪案件。不仅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而且诱发了大量的腐败现象，对社会主义经济生活造成重大危害。首批25起案件，涉案84人，其中有厦门市委副书记、副市长、海关关长、副关长，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中国银行福建分行行长、副行长，中国工商银行厦门分行行长等。84名涉案人员中有11人被判死刑，包括厦门市副市长、海关关长、中国工商银行厦门分行行长，福建

省公安厅副厅长；3人死缓；70人分别被判无期、有期徒刑。

腐败现象的出现，有复杂的社会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取决于人的主观因素。

问题四：

透过接连发生的事故和惨剧，看到的另一种腐败，一种让人更为触目惊心的腐败，从中可以透视出一些人的精神世界。

《半月谈》2000年第14期在最醒目的栏目“半月评论”中以最醒目的标题——“人命关天”发表了评论。

文章说：生命无价。真诚地去尊重，去爱护每一个普通的生命，是我们应有的良知，也是社会文明的基石。

令人心头备感沉重的是，太平盛世，我们的身边却接连发生一幕幕生命的悲剧：烟台海难、合江沉船、武汉空难、江门爆炸，还有霸州、禹州的警察行凶杀人，惠州市私企枪伤工人、中山市中横灯厂非法拘禁毒打工人……谁也不能断言生活中不会有意外事故发生，但是，在警钟频频敲响之时，为什么还会出现如此之多的灾难？不少灾害我们一时还难以抗御，但是这些分明由更多人为因素导致的悲剧为什么一再重演？灾难已经带来更多的痛苦和愤怒，但是我们是否已从中吸取足够深刻的教训和警示？世间最可宝贵的是人，人所最宝贵的是生命。直面这些生命的悲剧，我们理应去探索，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悲剧背后对普通生命如此的麻木和漠视？在直接责任人、肇事者被绳之以法之后，我们的一些管理部门、领导干部如何去举一反三、扪心自审？

这里有依仗权力对生命的公然的践踏。

霸州民警杜书贵拔枪将无辜青年杀害，还留下一句“名